



# 冷战、城乡和三线建设： 与美国学者柯尚哲先生的讨论

李德英 胡天鹏

**摘要：**近年来，海外三线建设研究逐渐热门，不断有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企业等角度展开研究，其中美国学者柯尚哲以冷战与军事化为视角，较为全面地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分析介绍，但其在讨论“冷战”格局下的中国国际环境时，忽视了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未能理解“三线地区”的深层含义；其“军事化”理论的解释亦不够全面，其“有特权的艰苦”的讨论虽然对城乡、工农关系有所涉及，但论证有限，并且未能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变化的历史长河中考察。

**关键词：**三线建设；海外研究；柯尚哲《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冷战；城乡关系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712

**收稿日期：**2022-12-04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8JZD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德英，女，重庆万州区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E-mail: scldy2004@163.com；

胡天鹏，男，四川资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线建设的研究在海外学界逐渐受到重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虽然已有学者对相关成果进行了介绍<sup>①</sup>，但仍有新成果不断涌现。如陈超(Chao Chen)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的四川省三线企业锦江厂为研究对象，从日常生活和劳动关系的角度审视企业内部的组织生态，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单位中，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并不是新传统主义下的简单强弱关系，由于地理隔绝、工人间复杂社会网络以及终身雇佣制等因素存在，工人的旷工行为往往能得到管理层的容忍，企业运作也因此更为有效<sup>②</sup>。李菊(Ju Li)以三线企业南方钢铁厂(化名)为研究对象，关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00 年左右该厂的转型过程，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变化与前现代性和经济改革主导话语之间的关系，关注企业与个体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所面临的重大社会、生活转折，同时探寻三线建设作为历史、档案与个人记忆的多重面相<sup>③</sup>。范敬亭(Jingting Fan)与邹本(Ben Zou)以三线建设相关城市、县区为样本，采用数学建模方法，计量分析在欠发达地区进行大量制造业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讨论三线建设对内地工业化的贡献，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促进了该地

① 参见：陈东林、段娟《三线建设史研究述评》，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50—352 页；柯尚哲《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开发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57—159 页；秦颖、刘合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132—142 页。

② Chao Chen, *Toleration: Group Governance in a Chinese Third Line Enterprise*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③ Ju Li,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n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a Third-front Enterprise i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2012); Ju Li, “How It Was/Is Told, Recorded and Remembered: The Discontinued History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8, no. 3 (September 2015): 314-341; Ju Li, *Enduring Change: The Labor and Social History of One Third-front Industrial Complex in China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 (Berlin: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19).

区经济转型,缩小了区域经济差异,但是投资溢出效应不好,全国长期总体经济效益并未得到有效提升<sup>①</sup>。综合来看,海外既有研究成果,大多从某个角度,或经济、或军事、或环境对三线建设进行研究,较多关注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执着于探讨经济层面的得失,忽视了政策制定的特殊背景,未能将三线建设还原到时代中进行考察<sup>②</sup>。美国学者柯尚哲(Covell F. Meyskens)<sup>③</sup>的《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则从“冷战”视角出发,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三线建设,描述并分析了处于城乡之间的三线单位职工日常政治文化生活,是海外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但其对“冷战”与“三线”概念的理解、“军事化”与“有特权的艰苦”中对城乡、工农关系的论析以及资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不少误解或不足。

### 一 柯著的主要内容及国外学术评价

柯著第一章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介绍了中国面临的多方军事战争压力。同时,柯尚哲也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进行了分析,将目光投射到后大跃进时期(post-Great Leap)中共领导人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认为毛泽东利用逐渐升温的外部压力来推动对中共党内“修正主义”的压制,并借此实践“毛式社会主义道路”。柯尚哲梳理了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三五计划”的重点如何从“吃穿用”转移到以国防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

第二章“好人好马上三线”,分别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视角对三线建设动员工作展开分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数百万城市工人去内地开展三线建设。为了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需要将大批工农兵送往内陆地区进行基础建设与工业生产。但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出于对地方利益的考量,在人员调动方面并非全力支持。在西南地区,饥荒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负责三线项目基础建设的西南局,对大量劳动力再次从农业流向工业充满担忧;上海市某些领导人则考虑到一大批熟练工人迁往内地后,上海工厂将难以完成既定生产指标,因而对人员的内迁多有掣肘。被动员的城市工人想法更为丰富,部分工人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主动自发地投身三线建设;另一部分工人则更关心物质回报、家属安置等问题,将参与三线建设作为筹码,与工厂谈判交换。

第三章讨论了三线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柯尚哲以“军事化”(Militarization)为切入点,描述了军事压力从国际竞争传导到三线职工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不仅将军事斗争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运用到三线建设中,集中力量攻坚某个或数个重点项目,在地方上打基建大会战,还向全社会宣传学习解放军精神,将建筑队伍军事化,多快好省地建设三线。该章以时间为线索,分别描述了三线建设1964—1966年的第一次高潮、1966—1969年间的停滞以及1969—1971年的第二次高潮。尽管柯尚哲以时间为刻度区分了三线建设的三个阶段,但是对两次高潮论述的逻辑一致,并未充分展现其中异同,对三线建设的内在变化分析不够。此点后文将详述。

第四章以四川大山深处的攀枝花基地为中心,展现三线职工的日常生活。该章重点描述了当时荒凉、恶劣的生存环境,如住“干打垒”、吃粗粮、单一匮乏的文娱活动等。党和国家要求三线建设的参与者,先生产后生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线单位与职工响应号召,在努力生产的同时,尽力改造生活环境,建设农场,组织篮球比赛、电影放映、文艺汇演等文体活动,建立托儿所与各级学校,逐渐形成一个小社会。总体而言,三线职工所处的环境虽然恶劣,远不如大部分职工原来所在的大城市优越,但比当时当地的农村优渥许多。

<sup>①</sup>Jingting Fan, Ben Zou,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ird Fro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Hinterlan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2 (September 2021): 1-34.

<sup>②</sup>例如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三线建设最主要的成就是通过铁路网络将中国偏远的内陆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促进了重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但其高昂的建设成本、大部分项目的失败以及调整改造所造成的又一次资源浪费,使其在经济层面弊大于利,故评价其是一次失败的经济投资。参见: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51-386(又见中译文:巴里·诺顿《三线建设:中国内陆的国防工业》,徐有威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299页);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 and Grow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7), 77.

<sup>③</sup>柯尚哲(Covell F. Meyskens),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目前为美国海军学院国家安全事务部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与当代中国史,《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冷战中国的军事化》[*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其近期三线建设研究成果有:“A Rich New Window into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Cold War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7, no. 3 (October 2022): 307-309.

第五章从经济层面对三线建设时期工业建设成果进行评估。柯尚哲认为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提出的三线建设经济方面的种种弊端确实存在<sup>①</sup>，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三线建设是那一时期唯一投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计划，意义非凡，不仅缩小了当时的中西部差距，还为后毛泽东时代内陆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工业化的协同配套和交通线路、邮政网络的搭建，将内陆与沿海紧密连接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更为一体化的中国<sup>②</sup>。

结语部分，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美关系改善，三线建设不再是经济重心，国家投资转向东部沿海地区，重工业让位于农业与轻工业。中国不再需要工业系统随时为军事战争服务，也不要求民众成为无视个人生活状况、随时投身保家卫国的后备部队，全国经济生活走向正常化。

《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出版于2020年，是目前海外第一部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研究专著。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平田康治(Koji Hirata)评价柯著多样的史料来源，认为该书将成为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重要著作之一，同时也指出部分三线建设项目自民国时期就已经有所规划，而柯著忽视了其中的继承关系<sup>③</sup>。斯特尔(Heather Marie Stur)认为柯著讲述了一个毛泽东时代中国所特有、但是与整个“冷战”世界相统一的故事，三线建设与同时代苏联、美国的军备建设并无本质区别<sup>④</sup>。江旷(Brian DeMare)认为柯著对海外中国史研究做出了两大突破性的贡献，一是为三线建设提供了一段深描式的历史，二是展示了如何从中国国内以及“冷战”视角去看待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活动<sup>⑤</sup>。周陶沫(Taomo Zhou)指出，柯著成功地将上层精英决策与下层民众故事连接在一起，是一部填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空白的著作<sup>⑥</sup>。丁榕俊(Youngjune Chung)认为，该书不同于之前的碎片化研究，系统地还原了三线建设这段历史，让读者得以从中国国内与国际等多个视角认识三线建设，填补了空白<sup>⑦</sup>。

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一书基本持肯定态度，且多次提到其开创性与奠基意义。笔者认为，柯尚哲的研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将中国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呈现给英文世界，在史料运用与观察视角上较之前的研究有所突破，为海外三线建设研究奠定了基础；柯著以“冷战”作为切入点，着重关注三线建设决策制定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探寻国际安全危机如何从政治层面进一步影响国家经济计划、城乡格局、企业生产与个人日常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意识又如何被军事化氛围所型塑；柯著试图还原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再现城市与乡村关系，工人与农民的思想、行为与日常生活。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究竟面临怎样的“冷战”格局？柯著的“冷战”与军事化视角是否能正确理解三线建设？值得进一步讨论。

## 二 “冷战”与“三线地区”概念辨析

关于三线建设决策出台的原因，国内已有学者从多个层面进行讨论，不仅关注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国际安全威胁<sup>⑧</sup>，也从高层领导人决策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sup>⑨</sup>。柯尚哲基本延续了国内学者的讨论路径，大体上以时间为线索，对不同国际环境下三线建设的兴起、转折与沉寂的过程展开分析，并以“冷战”为切入点，指出美国以“特殊战争”、“局部战争”等手段将战争控制在美国本土之外，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是“冷战”；但中国长

① 诺顿认为，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交通不便的偏远内陆，抑制了原本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工业发展，进而对中国整体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参见：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51-386.

② 关于三线铁路将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全国工业网络紧密地连为一体的具体论述，参见：柯尚哲《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周明长译，《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第49—68页。

③ Koji Hirata, review of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by Covell F. Meysken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9, no. 4 (November 2020): 996-998.

④ Heather Marie Stur, review of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by Covell F. Meyskens, *Journal of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9, no. 2 (November 2020): 212-214.

⑤ Brian DeMare, review of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by Covell F. Meyskens, H-Diplo, January 13, 2021, <https://hdiplo.org/to/E301>.

⑥ Taomo Zhou, review of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by Covell F. Meyskens,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6, no. 2 (May 2021): E14-E15.

⑦ Youngjune Chung, review of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by Covell F. Meyskens, *Pacific Affairs* 94, no. 4 (December 2021): 746-748.

⑧ 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第42—48页。

⑨ 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的转变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65—75页；李德英、陈梦遥《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形成和完善(1962—1966)》，《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2期，第94—110页。



期处于美苏争霸压力下,位于“冷战”的重要战场——东亚,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一直处于积极备战的“热战”中<sup>①</sup>。柯氏认为“冷战”不只是中国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一个名词,更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经济活动与民众日常生活,“冷战”视角能较好地将三线建设纳入到全球史的研究范畴之内。诚然,探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史与全球史绝无可能绕过“冷战”这一话题,但柯氏并未充分注意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与应对,对“冷战”格局下中美苏三国博弈与制衡的动态变化有所忽视,往往只将目光聚焦于其中双方,而忽略了第三方的地位与作用。

自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来自美苏两霸的威胁和压力,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里,中国在军事上只能重点对付一个主要敌人,他曾对周恩来说:“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sup>②</sup>因此,如何处理中美、中苏关系以维护国防安全,“反帝”抑或“反修”,一直是中共领导人思考的问题。

柯氏提出,在三线建设决策提出与实施的1964年,中国虽然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但主要军事假想敌是美国,三线建设正式开展的直接导火索也正是越南“北部湾事件”。但笔者认为,美越冲突加剧固然加速了三线建设决策的出台,但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中苏、中美关系认识的转变更为关键。

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安全战略与对外防御策略一直是以针对美国为主,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因此,中国主要的工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sup>③</sup>。基于此,中央军委制定了“北顶南放”的防御策略,将全国海岸线划分为死守地区和固守地区,长江以北坚守,长江以南放敌人进来,此时中苏关系良好,北方有苏联可以依托,因而可以死守<sup>④</sup>。

但是,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从口诛笔伐的公开论战逐渐加剧到频繁的边界摩擦,苏联不再是可以依靠的盟友,而是拥有巨大军事力量的潜在战争对象。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苏联屯兵中蒙边境,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得不转而考虑苏联对中国的威胁。2月27日,毛泽东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第一次谈话时多次提到苏联可能入侵中国,认为苏联在种种压制中国的措施不能奏效后,极可能对中国诉诸武力<sup>⑤</sup>。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sup>⑥</sup>。7月2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彭真、贺龙、杨成武等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战略问题,你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sup>⑦</sup>在实际作战准备层面,9至11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对华北北部地区进行战役勘察,并召开会议作了具体部署,逐步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sup>⑧</sup>。

如果说6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在一起。

面对美苏两霸的军事压力,尤其是原子弹威胁,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中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sup>⑨</sup>中共中央于1964年做出的三线建设决策,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也有防备苏联的成分。

柯氏并未对此种中苏关系的转变给予足够的重视,仅较多地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以柯著的叙述逻辑观之,三线建设兴起与沉寂的主导因素均是美国,中美关系是否紧张,决定了中国对三线建设的重视程度。这与三线建设的实际背景并不相符。柯著忽视了不同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三线建设重点建设区域均有所

①Covell F. Meyskens, “There Never Was a Cold War China,” Wilson Center, September 9, 2020,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there-never-was-cold-war-china>.

②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③李丹慧《1964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0页。

④胡哲峰《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24页。

⑤沈志华《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1页。

⑥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⑧《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编委会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不同的事实,导致其对“三线地区”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有所偏差。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他对三线地区的划分图中<sup>①</sup>。在该图中,柯尚哲向人们展示了他所理解的中国一、二、三线地区。但是,该地图存在明显错误与有待商榷的地方。首先是底图部分,在疆域划分上存在两个明显错误。第一处是中印边境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Aksai Chin)。此地区为中国领土,主权为中国所有,且一直在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下,柯尚哲在该图中将阿克赛钦地区划归印度,是一处明显错误。第二处为中印边境东段的中国藏南地区,他将其错误标注为印度所有。除去底图错误外,该图对于一、二、三线地区的划分也有待商榷。柯氏认为,三线地区包括青海、甘肃、四川、陕西、宁夏、山西、贵州、云南、广西数省或自治区的全部以及湖南、湖北、河南与河北等省的一部分;一线地区包括除云南、广西以外的所有边疆、沿海省份;其余省份属于二线地区。此种划分并不合理,且柯尚哲对三个地区的划分模棱两可。在2020年9月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文章中,他再次引用了该书中的三线地区划分图,并将新疆与西藏两个自治区划为二线地区<sup>②</sup>。

海外有关三线建设的研究,大多以荒凉偏远的西部来概括描述三线地区,并未进行严格的学术划分与界定。如范敬亭、邹本就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来指称三线地区<sup>③</sup>;而巴里·诺顿则指出,“大三线”为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全部,陕西省秦岭以南的地区,以及河南、湖北、湖南三省的西部地区<sup>④</sup>。与诺顿的划分相比较,柯尚哲更进一步将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部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也划为三线地区。目前,国内学者大多沿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的定义,即“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线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涉及当时的川、黔、滇、陕、甘、青、宁、晋、豫、鄂、湘、粤、桂等13个省或自治区,其中现在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湖南省和重庆市是重点地区”<sup>⑤</sup>。

总体而言,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于三线地区的界定,虽然在边界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大多采用明确的分界线来划分。这种方法较为明晰地区别了一、二、三线地区,为学术研究确定了明确的对象与界限,但正是这种确定性掩盖了三线地区的动态变化及其边界线的模糊性。因此,笔者认为,并不能将三线地区视作一个既定的、不变的概念。

如前文所述,一、二、三线概念因备战而提出,不仅将全国划为一、二、三线,在各省内部也有“小三线”。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三线的最初表述是:“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sup>⑥</sup>刘少奇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并强调“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sup>⑦</sup>。8月20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关于工业重新布局问题的谈话中再次表示三线包括西南的云贵川三省,“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sup>⑧</sup>。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后续的讨论与政府实际工作中,三线的范围逐步扩大。比如该年9月21日,李富春就在全中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sup>⑨</sup>。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有相似的意见:“总而言之,向云贵川、陕甘宁挤,还有个湘西、鄂西、豫西。”<sup>⑩</sup>以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六省及湖南、湖北、河南省西部地区为三线地区的划分逐步成型。

但“三线”是战略作战思想,当军事假想敌及其进攻方向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各地区的地位与重要性

①“Map 0.1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Fronts,” in Covell F.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5.

②Covell F. Meyskens, “There Never Was a Cold War China,” Wilson Center, September 9, 2020,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there-never-was-cold-war-china>.

③Jingting Fan, Ben Zou,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Construction of Third Fro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Hinterlan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2, (January 2021): 7.

④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54.

⑤国防科工委三线调整协调中心编印《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总结文集》,国防科工委三线调整协调中心2006年版,第2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55页。

⑦《刘少奇:搞西南三线现在要着手》(1964年5月28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49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91页。

⑨《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9月21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88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20页。

也随之发生变动。1964年5月,邓小平即认为,“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第二线”<sup>①</sup>,从中可以看出同一地区是否属于三线并非一成不变。8月初,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中的表述则更为明晰:“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sup>②</sup>这就是说三线与一线一样,都是相对的,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

1970年前后,这种动态变化最为明显。此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原本属于三线地区的甘、宁、青三省建设重点需要有所调整,逐渐内缩,“西北重点是建设陕南和关中地区,甘肃乌鞘岭以西和宁夏银川以北反修前沿地区有些重要工厂和建设项目,要分别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中南的桂西北、粤北地区的建设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华东要加强山东沂蒙、赣西北和皖南、大别山地区的建设,华北要加强山西太原以南地区的建设,东北要加强辽西地区的建设,以利独立作战”<sup>③</sup>。此时的“三北”地区已取代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对苏防卫作战已成为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sup>④</sup>。三线这一概念也不再局限于西南、西北这些与沿海相对应的内陆地区,而是一切能为纵深作战提供支撑的区域。

从上述三线地区概念及内涵变化的历程中不难看出,三线不等同于内地,三线的核心内涵是备战与后方。毛泽东甚至提出“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sup>⑤</sup>。随着军事假想敌及其进攻方向变化,后方必然随之改变,并不特指某一区域。三线地区应该是一个动态概念,并非某几条边界线所能简单涵盖。当然,就中国本身的地理环境而言,无论军事假想敌从哪个方向进攻,中西部数省均是后方所在,周恩来就明确指出:“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sup>⑥</sup>。总体而言,三线地区是以内陆地区为核心,受不同阶段的国际形势、领导人及政府决策影响,外沿动态变化的区域<sup>⑦</sup>。

若要在地图上对三线地区进行标注,笔者认为,应该舍弃之前的直接以一、二、三线进行阶梯式划分的方法。除三线地区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外,一些处在二、三线地区交界的省份,其部分市县有三线企业,是将整省划入,还是部分划入?若部分划入,其边界线又依据什么划分?这些都是绘图时所需面对的难题。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以三线投资项目、企事业单位为标注点的标点式作图法,将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到三线建设研究中,或许会有更多的突破与收获。

20世纪60年代末,一方面,美国逐渐意识到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和分量,并试图通过在亚洲进行军事收缩来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为了避免陷入两面受敌的尴尬处境,努力摆脱日益恶化的国际安全态势,亦尝试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柯著认为三线建设结束于1972年的重要依据是中美关系缓和,忽视了此时中美苏三国关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恰恰对三线建设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尼克松访华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完全改善。从1972年开始,中央军委要求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部队从单兵到分队都积极开展了打坦克训练,在苏军可能入侵的“三北”地区主要地段,构筑了大量抗击苏军坦克装甲集团进攻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在北京和华北、东北的大中城市,大规模修筑人民防空掩蔽部和坑道工事。直到1973年12月,毛泽东仍反复强调要准备打仗<sup>⑧</sup>。中国的备战活动并未因中美关系缓和而画上句号。

综合来看,柯尚哲虽然试图将中国的三线建设纳入“冷战”格局中进行讨论,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理解三线建设,但其在论述过程中偏重中美关系,对中苏关系重视不够,导致其对“三线地区”的概念把握不够准确,对不同时期三线建设的着力点、建设措施及内容认识不清,甚至有所忽略。

### 三 “军事化”、“有特权的艰苦”与资料误读

①李富春《关于计划安排的几点意见》(1964年5月28日),《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21页。

②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69页。

③《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草稿)》(1970年3月9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253页。

④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3页。

⑤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59页。

⑥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69页。

⑦陈东林编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⑧1973年12月25日,毛泽东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参见: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4页。



“军事化”是柯著的重要主题之一，其认为“军事化”贯穿于三线建设的缘起、建设、动员模式等各个方面。不仅体现在“冷战”背景下，三线建设因军事战争压力而加速，更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广泛号召人民群众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完成群众动员与三线项目的建设。

但此种“军事化”观点忽略了三线建设的另一重要事实，即三线建设对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以及全国工业布局日趋平衡的奠基作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sup>①</sup>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累计在三线地区投资达2000多亿元，逐步形成了一批新工业基地，包括以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为主体的关中工业区，以大型水电站、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兰州工业区，以机械、天然气、化工为主体的成渝工业区，以攀枝花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攀西工业区等，所有这些工业基地都大大促进了三线各省的工业发展与经济建设<sup>②</sup>。

运动式的“军事化”建设虽然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方式，但更为基础的是三线建设的常规化、革命化的设计、管理与建设体系。三线建设在项目选址、工业协作、垂直管理、点对点支援、地方物资供应等多个方面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sup>③</sup>，“军事化”动员与突击建设仅仅是在上述的既有规则体系内发起的应对短时间、地域性资源不足的办法。柯氏关注到了这种临时性、变通式的动员与建设方法，并将之提炼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特点，忽略了其背后更为庞大与完善的常规性建设机制，将三线建设的内在运行逻辑简单化了。

同时，柯尚哲利用多元现代性理论，论述了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目标和道路，对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也有所提及。他提出了“有特权的艰苦”(Privileged Hardship)概念，来形容三线职工的特殊处境，即一种需要阶级特权才能经历的苦难，认为三线职工的生活条件处于农村与城市的中间地带，是一座城市职工想逃离、农村居民想进入的“围城”。

柯氏描述了攀枝花建设之初工人的艰苦生活，因为三线企业遵循“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初期三线职工的生活条件普遍很差。柯尚哲认为，若仅将目光聚焦在工人的艰苦生活上，就会忽视其作为工人、城市户口拥有者的特殊权利；尽管三线职工在建设初期忍受着迥异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但同时也享受着远比当时当地农村更为完善、舒适的供应体系，政府为三线单位规划了道路、电力、自来水，在经历了最初几年的艰辛之后，三线单位逐渐拥有较为充足的食物、住房、学校和医疗资源，而彼时的农村地区，却难以获得国家、省(部)统一调配的各类物资；因此，柯尚哲指出：“尽管三线工人忍受着艰苦，但却是一种带着特权的艰苦，一种农村居民奢望的艰苦。”<sup>④</sup>

“有特权的艰苦”，既是当时大部分三线职工所经历的复杂处境，也是计划经济时期工农关系中工人状况的一个缩影。柯氏虽然注意到了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但对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改善工农关系作出的尝试与努力关注不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即“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者生产必要的食物”<sup>⑤</sup>，为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分离提供了可能。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城乡分离成为必然趋势，“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sup>⑥</sup>，私有制、异化劳动等原因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对抗，乡村逐渐处于资本关系的“边缘地带”，成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服务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倾销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在不断寻求超越城乡分离对立、实现城乡统筹融合的道路与方法，并认为“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sup>⑦</sup>，“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sup>⑧</sup>。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在试图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因工业化而牺牲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道路。毛泽东指出：“我们

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页。

②《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

③参见：张杨《三线企业选址与内地工业协作关系研究(1964—1969)》，《浙江学刊》2021年第5期，第229—238页。

④Covell F.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190.

⑤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405页。

⑦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⑧“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中是“差别”；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中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sup>①</sup>陈云曾提出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全国各地更平衡地分配大工业,使工业和农业密切地结合起来”的设想,“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原则,把企业适当分散地建设在全国广大地区,这对于现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有利的”<sup>②</sup>。而20世纪60年代展开的三线建设,正是将东北与沿海一带集中的工业分散到全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去。遵循“靠山、分散、隐蔽”选址原则建设的三线单位,不仅是中国工业与城市系统在乡村的飞地,更成为工农业接触、交流的前沿,以及改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试验田。

三线建设初期,西南地区项目建设的时间紧、任务重,为解决人、财、物捉襟见肘、不堪支应的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曾提出“以厂带社、厂社结合”的试点方法,并作为重要经验推向全国,这既是为解决三线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方案,更是对工农关系进行调整的一次探索与创新<sup>③</sup>。三线单位作为城市、工业一方的代表深入乡村腹地,与农民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在基础建设、日常生活、政治学习等方面展开互动,成为城乡关系改善的连接点。“厂社结合”、“以厂带社”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工农关系作出的努力与尝试,但在统购统销、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等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即使将工业散布到广大农村,也不能有效解决工农差别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试验与设想转瞬即逝。

在此之后,三线单位这种模糊的工农性逐渐消退,其作为全国工业体系一部分的特性日益凸显。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例,1965年,全国各地投入三线建设的医疗人员来到攀枝花,建立了当地第一所医院;到1978年,攀枝花钢铁厂平均每56个工人就拥有一个医疗工作者,是农村地区的61倍<sup>④</sup>。攀钢逐渐拥有了厂矿区内的学校、医院、剧场,一切配套成龙,成为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是三线企业与周边社会的真实写照。三线厂矿不仅是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更因为其封闭性、自足性而在文化上成为一座“孤岛”。这种社会与文化上的双重区隔,使城乡互动与融合变得尤其困难,城乡之间的鸿沟壁垒直到改革开放和自由市场的再次兴起才逐渐被打破<sup>⑤</sup>。

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是贯穿新中国发展的主要议题之一。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方针,让厂矿布局在广大农村,“厂社结合”、“亦工亦农”等政策试图将工厂与农村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工农并举的社会建设目标,但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仅靠局部的工农互动并不能有效打破城乡隔阂,上述政策也在实施中发生了形变。不过,作为试图弱化城乡、工农差别的重要尝试,三线建设初期的种种政策与工农互动模式仍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与研究。柯尚哲提出的“有特权的艰苦”理论视角,较好地描述了三线职工特殊的生存处境,为理解三线建设初期工农关系调试政策提供了一个窗口,但其分析解释的力度仍显不够,如同其“军事化”理论一般,对现象的内在逻辑未能深入考察,未能将其置于中国近代城乡及工农关系的历史演进长河中进行理解。国内学

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②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1959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③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也多有探讨。崔一楠、赵洋认为,这是三线建设时期工农互动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农民的参与为三线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和人力资源支撑”,而企业“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了周边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互惠互助关系(参见:崔一楠、赵洋《嵌入与互动:三线建设中工农关系的微观审视》,《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34—140页)。李德英、栗薪樾在对“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与推广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对其模式效果做了较为全面的讨论,认为“厂社结合”模式以消灭工农差距、城乡差别为出发点,但在实践中面临着种种矛盾,反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依赖工业、工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些矛盾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息息相关,“厂社结合”也因此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参见:李德英、栗薪樾《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检视(1965—1966)》,《史林》2020年第5期,第156—166页;李德英、栗薪樾《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的产生与推广》,《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0—121页)。徐有威、张志军则从制度创新角度出发,分析了“以厂带社”模式在全国推广过程中的流变以及产生的种种问题,认为“以厂带社”是一种低付出、高回报,能高效调动资源投入基础建设的创新性制度,但忽略了对农民工群体造成的事实上“同工不同酬”,最终在实践压力与时代变迁中沉寂(参见:徐有威、张志军《以厂带社:三线建设时期的一次改革探索》,《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第107—119页)。

④《关于做好1971年度人口统计工作的请示》,中共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中共攀枝花市党史研究室2000年版,第634页。

⑤参见: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26—31页;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第206—216页。



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

与以往的国外三线建设研究相比,柯尚哲在资料使用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自2011年起,柯氏多次来到中国开展资料搜集与实地考察,其书中使用的材料不仅有各类公开出版物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也有四川、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档案资料,以及120余人次的口述材料。但作为外国人,他在运用中文材料时难免存在错漏与偏差,既有未能正确理解材料本意的现象,也有资料随意取舍与误读之嫌疑。

例如书中第三章“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部分,柯尚哲论述“文革”对三线建设影响时引用的材料为:“在山西与辽宁地区参与小三线建设的工人们为了远离派系斗争而逃离工厂。”<sup>①</sup>经查核,材料原文为:

山西和辽宁就差些。山西……14.5高射机枪厂,原选厂址由于水源不足需要搬家,近一年了还未定。还把已经由天津抽调培训了的高射机枪厂的工人,因为工厂未建起来,工人没有工作就造反,又全部退回天津。辽宁也是如此,工厂虽都基本建成,但都没有投产。枪弹厂革命群众因为水源问题造反近一年至今还没有解决。<sup>②</sup>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山西、辽宁的问题主要在于工厂未建成或建成未投产,导致工人因为没有工作而“造反”,并非“派系斗争”;所谓的“逃离”(run away),则是指山西因为工厂未开工而将天津训练好的工人退回天津。此处柯尚哲的理解和表述,与原始资料相去甚远。

另外,柯尚哲在第四章“先生产后生活”中论述攀枝花的建设规划布局时,批评攀枝花建设者忽视了居民区的规划<sup>③</sup>。笔者按照脚注指引,检索原文后未发现相应论述<sup>④</sup>。而早在程子华带领考察队规划攀枝花布局时,就对工业区的公共福利设施和公用事业提出要求:“根据靠近工矿区,便利生产,便利生活的原则,拟分散布点,不搞城市”<sup>⑤</sup>。可见,攀枝花并非没有长期与总体规划,柯著的论点以及材料解读显然有待商榷<sup>⑥</sup>。攀枝花市作为在三线建设时期“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其城市化与工业化密不可分,攀枝花市几乎可以说是在攀枝花钢铁厂基地上发展而来的。攀枝花早期建设围绕钢铁基地展开,1965年成立攀枝花特区政府,政企合一,对外称渡口市<sup>⑦</sup>。最初的城市规划基本围绕矿区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生产生活,这是在有限资金投入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而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侯丽(Li Hou)将其称为“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sup>⑧</sup>。

#### 四 结语

综合来看,近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在海外逐渐热门,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日益增多,研究领域、类型逐渐多元化,研究资料和方法也有所突破,大量档案、资料汇编、口述采访等材料的使用,使三线建设的研究更为具体与翔实。柯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利用多样的史料来撰写完成。它既从宏观上对三线建设进行总括性的描述,又以多元的视角展现了三线建设的复杂决策过程以及工人、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海外第一部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著作,柯著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冷战”视角也将三线建设这段中国历史融入全球史视野之中。然而,另一方面,柯氏虽然使用“冷战”视角考察三线建设的整个过程,却忽视了其中同等重要的中苏关系变化,进而对“三线地区”概念理解存在偏差,忽略了三线建设的一些基本内容,对不同时期三线建设的重点变化关注不够。同时,其“军事化”及“有特权的艰苦”的观点,将三线建设动员与建设方式简单化,未能探讨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与体系。例证之一即柯氏对三线职工初期生活状况的观察有新意但仅停留于表

①原文为:“Laborers also ran away from factional struggles at Small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sites in Shanxi and Liaoning,” in Covell F.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144.

②《国家计委、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1968年6月20日),陈东林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第239页。

③Covell F.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176.

④在柯著中,该处脚注为:冶金工业部攀枝花钢铁公司编印《攀钢生产建设史(初稿)》,1983年印行,第31页。参见:Covell F. Meyskens,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176.

⑤《西南三线建设新建第一个钢铁厂放在弄弄坪的汇报提纲(第一次草稿)》(1964年9月25日),攀枝花市档案馆,档号:0002-001-006-91。

⑥此一观点由四川大学朱领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⑦四川省攀枝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攀枝花市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6页。

⑧Li Hou, *Building for Oil: 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133-134.

面描述,论证不够完善,未对其内在机理即城乡、工农关系进行梳理。此外,柯著较好地运用了多种中文史料,但对档案资料的爬梳与利用尚不充分,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纰漏与误读。最后,中国三线建设研究学者期待与海外学者互相交流学习的不仅是理论方法与“此山之外”的视角,还希望看到与三线建设相关的海外材料,但现在海外学者基本也只使用中国大陆的史料来研究三线建设。尽管柯尚哲曾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美国国防部与国家档案馆皆隐约显示美国国家安全机关不仅知道中国正在发动三线建设,甚至尚可能从外太空看出三线建设的布局与进展。”<sup>①</sup>但这些材料尚未有海外学者利用研究,期待将来这批史料能解密并得到有效利用,以推动国际三线建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的一次重大尝试,应当深入探讨三线建设在共和国史与全球史中的重要地位。海外学者的研究,如柯著探索了某些方法与路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冷战视角与工农关系,这都是新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学者应在与海外学者相互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学术关怀与问题意识并与全球史进行有效对话。

## Cold War, Urban-Rural and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Discussion with the American Scholar Mr. Meyskens

Li Deying, Hu Tianpeng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verseas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resear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scholars have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research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orporate perspectives. Among them, American scholar Covell F. Meyskens analyzed and introduced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mann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ld War and militarization. However, when discuss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Cold War" pattern, Meyskens ignored th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relations and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Third Front" region;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workers and peasants is involved, his analysis is inadequate and should be contextualized withi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such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overseas studies; *Mao's Third Front: The Militarization of Cold War China* by Covell F. Meyskens; the Cold War; urban-rural relations

[责任编辑:凌兴珍]

<sup>①</sup>柯尚哲《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开发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7—159页。